



□ 梁亚滨

作为一个国际政治学者，谈到文明，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美国政治学家萨繆尔·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的冲突”。1993年，亨廷顿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三年后他又将文中观点进行了系统阐释，拓展为一本专著，取名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在该书中，亨廷顿认为在未来世界中，文化的根源将取代意识形态或经济的根源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原因，所以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沿着文明的断裂带而展开。

在亨廷顿的哲学中，文明冲突将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因此他认为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但是，这种带有宿命论的观点和看待世界的视角带给世界的并非和平和安宁，反而是更多的冲突和问题。一方面，它强化了文明间的差别，甚至使文明的冲突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另一方面，“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似乎有强烈的划分势力范围的暗示。近些年，宗教恐怖主义活动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方不断出现，特别是伊斯兰国崛起以及对“应许之地”的想象，似乎在不断验证亨廷顿的观点。这也给世人提出了一个越发严峻的问题：能否以及如何实现各种文明和平共处？2019年5月15日，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召开，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现代人种学已经一再证明，尽管各民族间存在肤色、衣着和生活方式的差别，但人类却拥有共同的祖先。这些不同文明间的差别，例如肤色、衣着和看待世界的角度等，大多是不同地区的人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不断适应地理和气候环境的结果。例如白肤色和高颧骨等特征可以帮助人体接受更多的阳光，以生成更多的维生素，适应极地环境。相反，生活在赤道附近的人则需要较多的黑色素来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以避免晒伤和吸收过度的维生素，因此肤色较深。在长期的生活中，不同地区的人们逐渐积累起适应当地环境的生活经验。为了将这些生活经验以更加有效的方式传承下去，人们在实践中逐渐发展出一些实用的规范或者禁忌。这些规范和禁忌既可能出于卫生健康等实用原因，例如“不食自死之物”，也可能蕴含着某种美好的愿望，例如贴福字等。当这些规范和禁忌被以文字方式记录下来并被不断传承时，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神圣感，不但成为必须遵

循的法则，甚至成为某一文明的核心特征。坚持和维护这种文明特征，不但关系到该民族的生存延续，而且关系到该民族的尊严和荣誉。所以，强迫他人接受本民族的行为准则，既不必要，也没有道理，而且会因为“水土不服”而失败，以及因为冒犯他人的尊严而激起强烈的反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强调：“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种族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解决文明间的冲突困境不可能通过强调彼此间的差异，只能是相反。为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个“坚持”，作为中国回应这一世界性挑战的答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四个“坚持”当中，最为核心的毫无疑问是第一个：“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是数千年来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交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哪里有歧视，哪里就有伤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只有真正做到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各个文明之间才能真正做到和平共处。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各个文明之间才能真正做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历史上，但凡能够实施文化开放和宗教宽容政策的政权，往往都能够获得最大的进步和繁荣，不仅国土版图和财富增加，而且在文化和艺术上也会达到巅峰。中国的大唐即是如此，印度的阿克巴大帝时期也是如此。因为，只有在相互包容和借鉴之中，个人和群体的创造力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激发，做到“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相反，坚持文明差异和以差异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和他人，只会导致无尽的冲突和反抗，不断消耗国家和民族的财富与活力，不会带来任何真正的进步。因为对自身优越感的迷恋会丧失任何学习和借鉴的能力与勇气，只会导致盲目自大和故步自封。

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成为文明交流的意义所在。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类会赋予自在的自然以意义。欣赏美、传播美和成人之美是人类行为 of 诸多重要意义之一。这既是个人或者群体单纯的快乐的来源，例如各民族形式多样的好客之道，也是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推

动力。习近平主席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所以，各民族和各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不仅带来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大繁荣，而且不断推动世界向着更美好、更进步的方向发展。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和信仰，在中国形成独特的儒释道三教合一。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不但挽救了中华民族，而且使中华文明在不断学习和兼收并蓄中实现凤凰涅槃，再次在神州大地上焕发出无限活力和光彩。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是实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关键手段。面对差别，心胸狭隘的人会感到恐惧，想到歧视；心胸开阔之人则看到多彩，想到借鉴。历史实践一再证明，在孤立封闭的状态下，人类社会只会停滞；只有开放才能带来进步和发展，而只有包容才能实现真正的开放，才能真正做到相互学习和借鉴，做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做出了完美的解释。1776年，英国人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第一次提出财富创造的秘密：分工。分工所带来的专业化会大大提高生产力，再通过将剩余产品进行交流，能够带来个人财富增加，且进一步促进扩大社会生产，促进社会繁荣。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核心观点，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独特主张——比较优势理论，并且希望把亚当·斯密主张的分工与专业化扩展到国与国之间的范围。如果各国都能找准自己同他国比较之下的有利之处，即确定它们各自的比较优势，发展自由贸易对参与的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有利的可图的。所以，开放以及开放导致的自由贸易，带来了近现代以来各国经济的成功。以开放和自由贸易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带来市场的国际化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跨国界流动，通过国际分工，在世界市场范围内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使各国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此外，全球化还大大加快了技术扩散的速度，理论上能够使任何一个落后国家或民族实现跨越

障碍，要有政治站位、理论武装、组织制度、干部选拔培养、党员教育管理、党风廉政建设等作为基本支撑。《条例》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强化理论武装、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工作、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加强作风建设、加强纪律建设、抓好制度建设等8个方面，对党组全面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提出明确要求。对此，党组及其成员要

式发展。这一切都极大提高了人类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和速度，大大减轻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压力。但是，这一切的前提在于国家愿意主动开放，并且能够包容接纳他国的商品服务，以及背后的异质文明，实现和平交流与合作，互学互鉴。

“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是文明交流的目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目的在于实现共同发展，共享繁荣。现代化理论认为，500年前世界上每一个地方都是不发达的，而且是相互隔绝的，其特点是发展水平低下，人的观念一成不变，缺乏创新和不思进取。后来一些国家通过科学发明和技术进步，培育出企业家精神，实现了创新，成功地实现了向现代化国家的过渡。另外一些国家通过学习，也获得了成功。所以，在现代化理论看来，发展中国家得不到发展的根源在其内部，即是否愿意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主动与时俱进，通过开放、学习和创新来实现发展。事实上，即便是出现在文明断裂带的冲突，依然有强烈的经济因素。对极端分子来说，即便获得了个人物质意义上的成功，但是依然会因为本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失败，而在精神上感觉到强烈的失败、自卑与绝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报复其他民族的理由。因为相对于内疚，归咎于外部因素更容易获得心理上的接受。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近代以来成功摆脱失败国家命运的现实，能够给其他所有立志获得成功的国家和民族树立了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正面榜样。中国的成功也再一次证明了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发展模式：开放和创新带来进步，封闭和守旧导致落后。

文明交流既是国家发展的现实路径，也是应对全球化时代各种挑战的时代要求。如同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那样：“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在亨廷顿认为沿着文明断裂线会不断出现暴力冲突的情况下，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则提供了一个弥合文明间隔阂的平台，帮助亚洲及世界各文明开展平等对话，相互交流、借鉴与启迪。



强化政治担当，坚持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加强对本单位党的建设的领导，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提高党的建设质量。要始终把自身建设抓紧抓好，加强理论武装，坚定政治信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自觉接受监督，当好示范表率。

曾对家人说，我们是一身许国的共产党人，宗旨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告诫子女“绝不可依靠人家照顾你”。现在，我们常讲继承传统，坚持原则、不搞特殊，努力为了“大家”而不是“小家”服务，这是我们党的初心和传统，是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当铭记在心的规矩和原则。

纠正“亏欠太多，迁就补偿”的错误观念

有的领导干部认为，家里人过去跟着自己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现在条件好了，应当让他们好好享受一下。有的认为，自己工作忙，顾不上家里，欠家人太多，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们办点事，补偿他们一下，也未尝不可，“照顾不够，金钱来补”。还有的人认为，自己能有今天的发展，家人功不可没，有必要回报一下，只要他们不太出格，就不要去管。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有的领导干部公私不分，对家人有求必应，不管合不合规、违不违法，都尽力帮助，处心积虑为家庭成员谋取利益。有的对家人违纪违规睁只眼、闭只眼，听之任

自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任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新一轮金融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本文聚焦“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资金融通”问题，探讨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着力点，提出货币回流利率债市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思路。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构建回流机制

贸易项下的计价和结算货币存在上限瓶颈限制。贸易项下的计价和结算货币对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贡献有限：一是全球外汇仅5%左右的使用同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有关，绝大多数用于金融投资。二是由于人民币单边升值不再，贸易项下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表现实际上有所回落，且“811汇改”当月正是其历史顶点，高度依赖汇率走势的货币国际化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三是全球私人部门使用以美元为代表的霸权货币结算，形成货币使用的外部性，不断增强美元货币国际化地位。人民币作为大国经济货币的兴起，很难在短时间打破这种“货币惯性”。

建立回流通道实现金融市场融合才能打破瓶颈。从国际金融理论上说，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该国必须打通货币的跨境流动渠道，才能有效支撑甚至推动货币国际化。如果人民币“走出去”却不能随时“流回来”，即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若只看重向外融资而忽略投资回到在岸市场的话，不但对货币国际化的推动作用非常有限，而且也会令“走出去”越来越难。因此，必须为流出去的人民币提供一个比较安全、又有一定盈利的栖息地，并形成一种流动性管理机制，贸易或融资项下的人民币才会受到更广泛的接纳和欢迎。“一带一路”倡议下，近年来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取得了极大进步，其中，A股和利率债（国债和政策债）相继纳入国际主流指数，但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我国利率债回流机制潜力评估和发展思路

国债和国开债等基准产品已具规模且流动性优越。截至2018年年末，我国债券市场余额是8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2万亿美元），债券市场规模全球排第三。在岸和离岸债券市场在服务实体经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债和国开债已经形成了市场上完整的收益率基准曲线，其中，国开债已累计发行178万亿元，余额超过8.9万亿元，截至2018年底中债托管现券交易市场占比超过44%。

“债券通”推进和优惠政策落地确保回流通畅。2017年“债券通”的北向开通，标志着香港市场直通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回流机制打开。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我国在岸债券市场还将同全球各大人民币金融中心展开更为紧密而深入的合作。我国已经方便境外投资者逐步完善了多项政策安排，包括投资渠道、资金汇兑、税收和会计制

『一带一路』与利率债市场开放

度、风险对冲等。

外汇储备增持和项目建设发展增创利率债需求。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令各国央行不断增持人民币作为储备国货币。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同中国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国家 and 地区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国家的各类建设项目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开展，人民币通过贷款、熊猫债和贸易投资等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民币货币沉淀。

强化国际公共产品属性，做好风险预案，顺势而为。债市对外开放标志着我国主动保障境外人民币价值，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即在贸易项下的计价和结算货币持续发展的同时，更要集中力量以利率债作为境外主体手中人民币头寸的价值担保和流动性管理工具。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债市开放将不可避免受到外部冲击影响，在风险可测和可承受的情况下，利率债市场对外开放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过程要有序推进，水到渠成，顺势而为。

试点“附加发行”，形成外资持债有序推进的稳健模式。参考美债渐进式开放历程，通过“附加发行”机制分阶段开放利率债市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特殊附加发行，对于敏感项目和国别，在一级市场发行时确定发行价格，配置国别通过买方代理按确定价格进行资产配置。二是常规附加发行，在发行额度上进行定制服务，其发行和交易数据可完全公开。

讲中国故事，遵循国际规则，创新产品形成中国方案。一是加大对我国债券发行的国际路演，宣讲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二是丰富对冲工具以管理汇率和利率风险，增强现有利率债期货和标准远期产品的活跃程度，推出债券ETF等新的指数型产品。三是试点双币种货币债券，参照美国卡特债券，设计以美元作为债券本息的计价，按照约定或实时汇率进行人民币结算债券。



（上接1版头条）《条例》将党组讨论和决定的重大问题由原来的7项调整为12项，并规定：“党组应当紧密结合本单位实际，对前款规定的重大问题进行明确细化、列出具体清单。清单内容根据需要动态调整。”这种“列举+授权”的规范模式，为指导和推动党组自觉改进领导方式、更好发挥领导作用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制度保障。党组要按照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要求，

纠正“一人做官，全家享福”的错误观念

有的领导干部认为，自己当了官，是家族的荣耀，如果不为家族办事情，就是忘本，就是六亲不认。有的认为，既然干部可以为群众服务，当然也可以为自己的家人服务。还有的认为，自己奋斗打拼，为的就是让家人过上幸福生活，让他们沾点儿光是理所当然。有的不仅自己家人从此改变命运，七大姑八大姨沾亲带故的人都受到惠泽，大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架势。

领导干部的家人如果靠的是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奋斗和诚实劳动，获得事业上的进步和成功，自然无可厚非、值得鼓励，但如果靠的是领导干部权力的让渡、共享和代际传递走捷径，则为人所不齿、为党规党纪所不容了。这样做，不仅家人会被别人指指点点，领导干部自己的公信力也

学》里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我们党的领袖对家庭的重视、对家人的关爱、对家风的培育，无不昭示着这样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

纠正“一人做官，全家享福”的错误观念

有的领导干部认为，自己当了官，是家族的荣耀，如果不为家族办事情，就是忘本，就是六亲不认。有的认为，既然干部可以为群众服务，当然也可以为自己的家人服务。还有的认为，自己奋斗打拼，为的就是让家人过上幸福生活，让他们沾点儿光是理所当然。有的不仅自己家人从此改变命运，七大姑八大姨沾亲带故的人都受到惠泽，大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架势。

领导干部的家人如果靠的是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奋斗和诚实劳动，获得事业上的进步和成功，自然无可厚非、值得鼓励，但如果靠的是领导干部权力的让渡、共享和代际传递走捷径，则为人所不齿、为党规党纪所不容了。这样做，不仅家人会被别人指指点点，领导干部自己的公信力也

之、放任自流。还有的为了让人家过上体面的生活，疯狂捞钱，自己以低调简朴示人，家人却奢华无度。

领导干部工作繁忙，无法分身照顾家庭，处理家务的事情很多时候就落到了家人的头上。有的为了支持领导干部的工作，舍弃自己的事业，把服务和保障好领导干部的工作当作自己的“主业”。应当说，领导干部不容易，领导干部的家属也不容易；领导干部付出得多，领导干部的家属作出的牺牲也不少。如果说领导干部的工作取得一点成绩，这个中既体现着组织的关心培养、个人的奋斗努力，也凝结着家人的辛勤付出，军功章里也有对方的一半。领导干部也是人，爱护家人是人之常情。亲情爱情深似海，但党纪国法大如天，对家人的“爱”应当有分寸、有原则、有底线，不能错爱、溺爱、宠爱。家人付出多，领导干部心有愧疚，在精神上、情感上、行动上作些补偿和回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补偿并不是单纯的物质补偿，更不能借自己的权力为家人谋私来代偿这种亏欠。

毛泽东的家人为革命作出巨大牺牲，多位亲人为国捐躯，可他从未因此而为牺牲亲人的家属谋取私

利，他的原则是：“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杨开慧胞兄杨开智为掩护毛泽东的革命活动、保护毛岸英三兄弟作出巨大努力，其女儿杨展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参加革命，后在华北抗日战争中牺牲。新中国成立后，毕业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长期从事农林专业工作的杨开智，向毛泽东提出“在京或在湘安排厅长之类的职位”的请求，被婉言拒绝，毛泽东要求他“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按理说，杨开智作为当年少有的大学生，在湖南某农场工作干得也不错，又为革命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党和政府予以适当照顾也在情理之中，可毛泽东并没有因亲情而放弃原则。他曾说，我现在当大官了，如果翻脸不认人，人家就会说共产党无情无义，何况有些人过去还帮助过我，帮助过我们党。但如果有求必应，那就成了国民党样子的了，久而久之，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垮台。对领导干部来说，面对“欠了情”的家人，就应当公事公办、公私分明，做到欠情不徇私情、回馈不忘原则。唯有如此，才是领导干部必须恪守的为官待事之道。